

鲁迅
研究

LUXUN
YANJIU

13

鲁 迅 研 究

13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

《鲁迅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庆培
责任校对：方 鉴
封面设计：赵友兰
版式设计：王丹丹

鲁迅研究
第 13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新华书店 经 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保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92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50册

ISBN 7-5004-0132-9/I·15 定价：4.00元

目 录

· 思想研究 ·

- 鲁迅早期启蒙主义思想的特征及其历史意义…… 林 非 (1)
- 鲁迅早期社会思想初探…… 张永泉 (23)
- 论鲁迅早年社会思想与空想主义思潮…… 苏 冰 (56)
- “自由驱使”西方文化一例
- 鲁迅之于约翰·穆勒…… 徐允明 (83)
- 鲁迅艺术理论中的西方思潮…… 王观泉 (96)
- 貌殊而质一，形异而神同
- 鲁迅和郭沫若前期审美趣味比较…… 周惠忠 (119)
- “遵命文学”辨…… 李维鼎 (133)
- 鲁迅对创作过程中几个问题的认识…… 杨振铎 (154)
- 鲁迅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到杂文的根本原因…… 张晓夫 (162)
- 鲁迅成才内因概说…… 张国栋 (171)

· 作品研究 ·

- 论《呐喊》《彷徨》的喜剧艺术…… 王富仁 (190)
- 喜剧·悲剧
- 鲁迅与契诃夫小说艺术特色的比较…… 徐 萍 (223)
- 《呐喊》《彷徨》的抒情特征…… 余连祥 (239)
- 鲁迅小说的艺术对比…… 周恩珍 杨九俊 (259)

论《狂人日记》的艺术特色·····	王超华 徐晓村 (275)
旧道德的艺术揭露与批判	
——《阿Q正传》道德观剖析·····	谷辅林 牟书芳 (292)
《锻炼》和《阿Q正传》的比较分析·····	李振坤 (306)
阶级分析方法与《祝福》研究·····	安永兴 (322)
从子君到莎菲	
——浅谈“新女性”的艺术形象及其	
美学价值·····	陆文采 (334)
鲁迅笔下的两个庄子·····	钱碧湘 (351)
微言含大意，重彩点龙睛	
——鲁迅小说的标题艺术·····	王和平 (360)
伟大人格的艺术投影	
——鲁迅散文研究札记·····	卢 今 (368)
“譬论”和“串喻”	
——鲁迅杂文艺术论片·····	周蕙秀 (390)
鲁迅杂文教学与研究的思考·····	林运来 (400)
正确理解《白莽作〈孩儿塔〉序》·····	戴 翼 (413)
鲁迅书信掠影·····	张啸虎 (425)
我对《自嘲》中“孺子牛”的理解 ·····	陆志亢 (438)

· 生平研究及其他 ·

关于鲁迅论金圣叹哭庙案的辨证·····	钟来因 (444)
鲁迅和秋瑾·····	蒙树宏 (454)
鲁迅与徐懋庸的友情·····	郑心伶 (460)
漫谈绍兴目连戏·····	徐斯年 (469)

• 国外鲁迅研究 •

消沉，创作和转变

——《鲁迅的现实观》第九章·····

·····〔美〕威廉·莱尔著 袁良骏译（484）

西洋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

·····〔英〕钦纳里著 唐海涛译（502）

鲁迅早期启蒙主义思想的特征 及其历史意义

林 非

以“五四”为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激进和最为系统的一次反封建思潮的迸发。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它具有两重巨大的意义：回顾过去的历史，它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是为辛亥革命之前未及在人民群众中很好普及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运动进行补课，瞻望未来的前景，它是从自己这个反封建的启蒙主义要求，急剧地向着社会主义的理想过渡和发展，充分显示了只有向更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前进，才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整个世界也必然会走向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重复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出现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因而变得黯然失色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过时的追求了。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确实是宣传反对封建主义和巩固共和制度的十分全面的主张，因为从这一方面说来，“民主”和“科学”是密不可分的一身二翼。封建主义制度必然是专制和独裁的，而专制和独裁又必然会造成愚昧和迷信，因此可以说封建主义制度的两大特征就是专制独裁的愚昧迷信。要反对专制独裁和愚昧迷信这两个纠缠在一起的畸形的怪物，“民主”和“科学”这两样武器就缺一不可。有了科学的精神，民主的思想才能够十分牢固地深入人心，在一个

不科学的愚昧迷信的社会里，是绝对不可能实现民主的；有了民主的思想，科学的精神才能够得到充分的普及和发扬，在一个不民主的专制独裁的社会里，是绝对不可能发展科学的。

这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自然科学——它同希腊人的天才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可以说得上是唯一的科学——是和封建主义被市民阶级所粉碎的那个伟大时代一起开始的。”^①科学的前进和发展，是孕育于封建主义母体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成熟的结果，而当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步确立之后，又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且它也必然会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趋于准确，必然会认识到封建主义制度的极端荒谬性，因此可以说科学是十分革命的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要求，也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和科学水准不断发展的结果，可见“民主”和“科学”必然是携手共进的。

“五四”启蒙运动对于“民主”和“科学”的提倡，确实可以促进人民群众文明素质和思想觉悟的提高，然而这个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能否在人民群众中迅速收到这样的效果，还必须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即在进行这种思想启蒙的时候，人民群众原来已经具有的思想水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维护封建主义制度中专制独裁和等级特权的正统观念（强烈的尊卑观念抑制底下的奴性意识），曾经长期摧残和束缚过人民群众，象这样的正统观念有没有受到过反正统思潮的冲击和廓清呢？如果从来就没有被很好冲击和廓清过的话，那么生活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的大多数人们，是很难接受以平等观念为基础的民主思想的。

体现封建主义统治原则的儒学正统思想学说，确实是强烈地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初稿》。

排斥和弹压民主主义思想的，始终坚持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在这种政治和伦理一体化的原则底下，人们只要对封建统治者稍不驯服，多少敢于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就有可能被指责为最不具备道德的“禽兽”之行，死心塌地充当奴才是取得平安的唯一途径。封建统治者正是凭着这种政治和伦理一体化的原则，可以将政治上的任何异议者从道德上加以彻底否定，使他们在人民群众中被唾弃和孤立，这样来扼杀民主思想的萌生，因此这是极端反动和野蛮的。

中国正统儒家所主张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②，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又形成了学术和伦理一体化的原则。人们只有崇奉儒家的经典，永远在这封闭和保守的圈子中讨生活，才能够被认为是尊贵的上等人，而如果去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最多也只能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畴人”而已。这种学术和伦理一体化的原则，势必也就阻碍和扼杀了科学的发展。

在一个具有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中间，政治、学术与伦理这三者都不是纠缠在一起的，任何在政治和学术问题上进行独创性探讨的情况，都不需要冒受到道德方面谴责的风险，因此，学术和政治问题就可以得到自由的论辩，社会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民主”和“科学”的长期不能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在中国封建主义的小农经济社会的土壤中间，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十分低下和缓慢，因而就无法为“科学”和“民主”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地了。不过这是属于和启蒙主义思想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范围内的问题，尽管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鲁迅自然是一个十分杰出的先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周易·系辞上》。

驱者，然而在他当时的思想体系中，间或出现谈论“科学”的地方，却几乎没有出现过谈论“民主”的字眼，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问题是在于鲁迅异常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人民群众的思想依旧受到封建主义意识的严重钳制，要想实现发展“科学”和“民主”的主张，那就象前面分析过的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鲁迅坚持自己早在十年前就提出过的主张，即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具有接受此点的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的前提。在鲁迅看来，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不存在这样的前提，这种认识长期支配着他的思想，因此他才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启蒙主义思想线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①，“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各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②。

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高潮中间，鲁迅竟还认为“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③。这自然是带有片面性的看法，“中国人”怎么会没有“感染性”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在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底下，发生了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发生了宣传和普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呢？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起来，却又可以发现在鲁迅的这个看来是错误的命题中间，确实存在着相当深刻的合理内涵。

辛亥革命和“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虽然已经轰轰烈烈地发生了，但是对于全体“中国人”的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来说，究竟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中国人民依旧在沉重的封建主义思想氛围底下，遭受着无穷无尽的摧残与扼杀，他们几乎是仍旧过着从前那样悲惨不堪的生活，几乎是仍旧保留着从前那样暗淡无光的

① 《坟·文化偏至论》。

②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③ 《书信·200504 致宋崇义》。

精神面貌，鲁迅犀利地看到了这样的现状，而且他观察的焦点依旧是紧紧抓住思想和精神领域的问题，他急切地思考着怎样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摆脱封建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羁绊，改变长期形成的愚昧、麻木和冷漠的精神状态，对“民主”和“科学”出现更活跃的“感染性”呢？

这正是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见解超过同时代人的深刻之处，正是在这里充分显示出他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无比关切，而不是发表一些肤浅的、廉价的、虚假的和心不在焉的赞美之词。他正是凭着这种神圣的责任感，深刻地思索着如何能使“中国人”对于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出现真正的和深层的“感染性”，因而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鲁迅这个深刻见解的片面性，原来是出自两种不同逻辑推理的混淆，在于他将启蒙主义的关键问题（如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能否很好提高），和人民群众在其他领域的许多问题（如人民群众对革命运动的热烈拥护和坚决参加），搅在一起作出判断了。正因为是这样的缘故，鲁迅有些属于启蒙主义范畴的对人民群众的见解，从表层上看来或许往往具有偏颇和片面性，然而当剖析到它的里层和内核时，却可以发现它非凡的深刻性。这正是对整个民族的命运始终焦灼不安，急于从思想根柢上找到光明出路的启蒙思想家常有的表现。

问题的关键确实在于人民群众已有的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究竟是否能够迅速有效地接受“民主”和“科学”的主张？鲁迅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高潮过去很久之后，依旧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认为“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①，甚至在他逐步接受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道路上，也还依旧表

① 《华盖集·通讯》。

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①在估计人民群众与革命的关系这一点上，鲁迅笼统地作出这样偏低的估计，无疑可以说是具有片面性的，关于这一点过去是已经有了定论的，不过问题还在于这定论只能适合于人民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这一点而言，如果竟是笼统地认为，鲁迅对人民群众接受整个现代文明观念的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的估计也都不准确的话，这才真正是片面性的结论了。

人民群众是会参加反封建的革命的，是会欢迎“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的，然而由于他们深受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蹂躏和腐蚀，长期积淀而成的缺乏独立的自觉意识的顺应状况，尚未很好具备接受现代文明观念的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却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都难以完全改变的，鲁迅对此的见解确实异常深刻，因此他渴望着在“民主”和“科学”这社会政治范围内进行思想启蒙之前，还应该在思想和精神领域内进行深入的启蒙，以便形成人们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这就是他在“五四”之前的十年，早已提出过的那个惊人的命题：“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③。

从整个世界思想和文化史的角度来说，鲁迅从“尊个性而张精神”达到“人各有己”的“立人”这个命题，实际上是要求人们能够冲破封建主义思想的摧残与束缚，要求人的精神与理性、智慧与才能，都可以获得充分的发展，要求人的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能够获得确立和发扬，这就与陈独秀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注意的侧重点很不一样了，他的工作主要是类似法国启蒙运

① 《三闲集·铲共大观》。

② 《坟·文化偏至论》。

③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动中以“天赋人权”为重大吸引力的课题，而鲁迅则更要上溯到类似欧洲文艺复兴中的课题了。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性的觉醒，是平等思想的大普及，这使人类在精神上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解放，而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则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成果，侧重于在社会政治领域内进行前所未有的极其宏伟的建设，将人类长期形成的平等要求和民主主义思想，归纳成为清除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体系，形成和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这就推动人类极大地向着历史的高度飞跃。当然归根结底说来，这只能是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掩盖不住人们在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的不平等状态，因此这种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平等原则和民主政体，就不能不具有它片面性与虚假性的局限了。

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提出这种人性的觉醒和平等的要求，都是对笼罩于中国土地上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猛烈冲击，自然是有着十分巨大的进步意义。这运动中极大多数先驱者所提出的命题，接近于法国思想启蒙运动中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要求，而在“文学革命”方面表现出来的却更多地接近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鲁迅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他渴望着出现“真的人”^①、“完全的人”^②和“觉醒的人”^③，这都是他十年前“立人”主张的重申。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排比论列，还特别指出“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这确实是很见地，如果用这一见解来衡量鲁迅思想轨迹的意义，对我们就尤有启迪了。

① 《呐喊·狂人日记》。

②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③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

对于形成人们的独立的自觉意识来说，鲁迅确实是早在“五四”的十年之前就进行了。当时正处于辛亥革命前的紧张搏斗的气氛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忙于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起义运动，又在思想战线上继续与维新派和立宪派较量，这些繁忙的起义和论战活动，使他们无暇集中精力去完成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这一根本意义上的启蒙工作。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当时在中国这块贫瘠和荒凉的土壤中，满布着异常落后的社会思想意识，这就决定了无法产生象莎士比亚对人性觉醒的要求，或卢梭对“天赋人权”的要求那样宏伟和系统的思想来，尽管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涌现出过不少杰出的人物。

在辛亥革命前从事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中间，还不满三十岁的青年鲁迅无疑是一个十分杰出的人物，他抓住了“立人”这个重要的关键问题，企图从事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他的基本方案是“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就是说要冲破一切束缚着人们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通过个性解放的途径，确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要求每个人都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个性”和“精神”，鲁迅为此而突出了“内曜”和“心声”的意义，认为人们的“内曜者，破黯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①。“立人”的基本建设是从振作他们的“内曜”与“心声”开始，这样才有可能“尊个性而张精神”，才有可能出现“国民精神之发扬”的“自觉之声”^②，而“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② 《坟·摩罗诗力说》。

然独见于天下”^①。

只有当每个人都具有了独立的“内曜”，自觉的“心声”，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做到整个民族的“立人”，鲁迅极为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各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②，当每个人都具有了这样真诚和觉醒的内心世界，具有了这样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作为群体来说自然也就觉醒起来了，正是这样就有可能建成他理想中的“人国”。

青年鲁迅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解决得极富辩证逻辑的见地，“立人”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整个群体的觉醒问题，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能从“尊个性而张精神”出发，个性解放是人们从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必由之路，只有出现了人的觉醒和尊严，出现了人的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这样才不再是一种浑浑噩噩和随人摆布的盲目性的存在，而是洋溢着积极主动性的生机蓬勃的存在，这样的人才说得上能为人类最美好的伟大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达到了这种自觉意识的“人各有己”的人们，自然会“群之大觉近矣”的。《共产党宣言》在预测人类改变从本质意义上说来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曾提出过“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只有存在了“人各有己”的这个条件，在这个自觉地进行联合的群体中，通过人们之间相互协调的分工合作，才有可能获得更为充分和合理的自由，科学化的集体主义原则正是从这儿产生出来的。如果抹煞了群体中间个性的独立发展，丧失了人们作为存在本质的个性，那就只能是机械和僵化的压制性的组合，只能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一种新的桎梏，使绝大多数人只能沦为统治者或野心家的群氓与驯服工具。如果这种泯灭个性的独立和

① 《坟·文化偏至论》。

②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自由发展的群体，也被一概称之为集体主义的话，那就绝不是真正的而是虚假的“集体主义”了。鲁迅论述这种“己”与“群”的关系之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辩证逻辑，无疑是他后来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契机。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思想启蒙与论战中，象鲁迅这样细致和深刻地考虑人民群众思想水准与觉悟程度的问题，将它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步，确实是抓住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关键，这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先驱者们，几乎都没有将对人民群众思想水准与觉悟程度的考察，置于他们启蒙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象邹容的《革命军》尽管也沉痛地看到了封建制度毒害下的“我同胞无种性，无自立之性”，也在这方面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然而怎样解决这个始终使鲁迅苦恼地思索的问题呢？邹容开出的方案竟简单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洲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它，能自认为国民耳。”他认为通过自己的“一言”，就可以“叫起我同胞”，象这样过分夸大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与鲁迅“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①，多少有点儿相似之处。

鲁迅在提倡个性解放以便通向人民群众觉醒的同时，因为对人民群众落后精神状态的估计有所夸大，所以又发表了“属望止一二士”的观点，这是他十分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中的弱点，邹容恰巧也有类似这样的弱点，这是由于对还不具备全面的唯物史观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来说，夸大个人作用的思想认识是在所难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免的，鲁迅正是这样才接受了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甚至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①。邹容和鲁迅既具有这同样的弱点，却又同样准确地都看到了人民群众落后的精神状态，不过邹容对此的触及只是表层性的，实际上并未真正深入地认识其严重之处，他竟认为只要人民群众“自认为国民”，就立即可以“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其实从“奴隶”的精神状态演进成“国民”的精神状态，这是谈何容易的事，需要经过相当长期的过程，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就经历了从文艺复兴直至法国启蒙运动这好几百年的时间。至于美法两国的人民群众，也绝不可能象邹容说得那样轻而易举，在独立或革命的前夕，顷刻间就由“奴隶”变为“国民”的，他们其实是在此之前，早就培育和激励着作为人的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了，这样才有可能取得独立或革命的胜利。鲁迅将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准和觉悟程度，作了充分困难和严重的估计，将这置于最为首要的位置上进行思考，这就比邹容的思想逻辑要深刻得多了。

孙中山对于自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然而他是建筑在这样的理由之上的，“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②革命是顺乎社会发展潮流的正义事业，在当时只有通过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才可能趋于文明，这是说得千真万确的，然而在进行这场革命时，如果同时也能够考虑到怎样通过思想启蒙，使整个民族更好地产生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这样才更会使他们出自内心要求地萌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因而可以从根本上保证革命的成功和巩固，孙中山对于此点却未像邹容那样予以

① 《坟·文化偏至论》。

② 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